

袁锐铎 吴起林 著

——亚洲『四小龙』比较研究

经济发展中的高等教育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广东省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经济发展中的高等教育

——亚洲“四小龙”比较研究

袁锐鐸 吴超林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发展中的高等教育：亚洲“四小龙”比较研究/袁
锐锬，吴超林著. -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12
ISBN 7-5361-2112-1

I. 经… II. ①袁… ②吴… III. 高等教育-对比研究-
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 IV. G64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8543 号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大道北广州体院内 20 栋

邮编：510076 电话：87550735

番禺市石楼官桥彩印厂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12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定价：20.00 元

目 录

0·导论	(1)
0·1 引言	(1)
0·2 主题: 经济发展中的高等教育	(2)
0·3 思路: 从经济与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对应性的描述到相互关系的探讨	(5)
0·4 意义	(8)
0·5 方法	(10)
0·6 本书的逻辑框架	(12)
1·台湾、韩国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对应性及其相关分析	(15)
1. 1 经济发展阶段确定的理论依据	(15)
1·2 经济发展的阶段及其战略选择	(21)
1·3 台湾、韩国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	(36)
1·4 台湾、韩国经济与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相关分析	(51)
2·香港、新加坡经济与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对应性及其相关分析	(71)
2·1 香港经济发展的阶段及其战略选择	(71)
2·2 香港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	(77)
2·3 新加坡经济发展的阶段及其战略选择	(85)
2·4 新加坡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	(91)
2·5 香港、新加坡经济与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对应性	(98)
2·6 香港、新加坡经济与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相关分析	(100)
3·“四小龙”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高等教育投入分析	(106)

3.1 增长中的格局	(106)
3.2 投入配置的模式	(131)
3.3 师资投入的实证分析	(148)
3.4 可供选择的高等教育投入政策	(158)
4. “四小龙”高等教育的供求及其调控方式	(166)
4.1 制度框架	(166)
4.2 产业结构变迁中的高等教育需求	(169)
4.3 供给引导需求还是需求引导供给	(185)
4.4 产出配置模式与结构交易成本	(194)
4.5 高等教育运行中政府的角色	(201)
5. “四小龙”高等教育规模经济分析	(205)
5.1 “四小龙”高等教育微观规模经济分析	(206)
5.2 “四小龙”高等教育宏观规模经济分析	(213)
6. 发展的模式	(246)
6.1 人力资本：革命与神话？	(246)
6.2 高等教育发展的陷阱	(253)
6.3 经济奇迹在多大程度上来自高等教育？	(262)
6.4 “四小龙”的模式比较与启示	(266)
后记	(278)
主要参考文献	(280)

0·导 论

0·1 引言

中国对现代教育经济价值的重新发现始自改革开放的艰辛历程中，当国门开启之后，中国才蓦然发觉世界文明的进程早已被合乎规律的行为推进到了另一个新高，甚至原来与中国同处一起点的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也都变成了“小龙”。经纵横比较后的反思方知，发展的举步维艰根源于人力资本的的匮乏。基于对文明前途的担忧，社会各层有识之士要求快速形成人力资本，增加教育投入的呼声越来越高，并获得了强烈的认同。决策层、理论界一改过去视教育为纯消费福利事业的观念，将教育列为产业发展的战略重点部门。如此这般，可见中国社会对经由教育形成能与物质资本共同作用的人力资本支撑起华夏文明的迫切愿望。如何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让滞后的步伐赶上世界发展的潮流？世界发展史业已告知：已开发国家（地区）所走过的道路一般也是待开发国家（地区）所要遵循的。因此，背景与我们相似的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自然成为可资借鉴的最好典型。

必须承认，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的背后存在各种复杂的原因，并且已引起了广泛的探索。当把教育作为相关分析对象得出并且日益强化它对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的结论时，也许这是正确的。然而，当具体到教育不同的层次结构，而不是笼统意义上的教育时，纯粹从经验推断出的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相关的结论却显得并不那么切实。诚然，在一定的条件下，经由高等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如果避开高等教育投入产出既定的外部条件而无限强化高等

教育的作用，那么，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结论就值得反思。历史已经证实，亚洲“四小龙”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非完全如众所说是线性的。因此，如何客观地分析“四小龙”经济发展中的高等教育并借鉴其有益的经验正是本书立意之意。

0·2 主题：经济发展中的高等教育

本书以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中的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

兴起于中世纪的近代高等教育，其最初的动因来自文化继承与宗教传播及政治争斗的需要。数个世纪之后，当人文运动以其锐不可挡的力量打破黑暗中世纪的宗教一统局面时，高等教育方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发展的压力下开始兴盛。综观高等教育的早期发展史，与其说是一种社会需要，还不如说它是一种阶级特权和文化享受更贴切。整个高等教育运行过程中，无论是从内部还是从外部，都未曾明显地发现经济因素制约其中。经济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关系可以说是在产业革命促使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提高之后才孕育出来。如果要从时间上界定，那么 19 世纪中叶以后被公认为经济与高等教育相互作用的开始，而经济取代其他非经济的因素成为决定高等教育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则是 20 世纪以来的事情。至此，我们可以将经济与高等教育相关分析的逻辑起点界定在 20 世纪初期。之后，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从投入还是从产出方面皆受制于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之所以对高等教育的分析要将视角限定在经济发展之中，原因是如此一来，能从最基本和最核心方面把握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进而探寻到最佳的发展模式。

由特殊的制度环境所决定，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的高

等教育基本上都是本世纪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如所周知，台湾、韩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沦为日本殖民地，香港和新加坡则更早纳入英联邦（其间都一度被日本占领）。既然属于殖民地，高等教育自然不会在殖民统治下兴盛。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屈指可数的几所高等教育机构，多半也是为加强殖民统治而设。尽管此时先进国家的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但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早期的高等教育却深深烙上殖民政治的印记。直到二战结束后，受着高等教育多重功能目标及经济发展、人口激增、政治民主、教育水平提高等的压力，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的高等教育发展才日益体现出与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相比较而言，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存在滞后的特征。这是因为，一方面，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尚未对高等教育有迫切要求，另一方面，殖民统治下不可能形成高等教育发展的条件。因而，要研究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必然只能选择各自开始推行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时为其逻辑起点。基于此，本书在分析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相关的逻辑起点问题上，台湾选择的是 50 年代，韩国选择的是 60 年代，而香港和新加坡则选择 70 年代。当然，这种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资料搜集的困难使然。不过，这种差异与各自的实际情况却是基本一致的。

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相关的逻辑起点既已确定，而且对此甚少有疑问，那么，接着所要切入的就是本书的主题——经济发展中的高等教育发展问题。

关于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来自各自发展高等教育的要素作用，这一直是一个歧议颇多的论题。以往对亚洲“四小龙”高等教育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描述性的正面具体经验的介绍方面，对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流行结论与对

基础教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毫无二致。其实，高等教育是一种专门性教育，它与基础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客观地存在着差异。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分析都更为复杂。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要形成正和博弈受到诸多条件的严格约束，而并不像通常所认为两者之间是线性对应那么简单。可以说，从非线性的基本事实出发是正确分析高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科学前提。经济发展不仅从投入，而且也从产出方面制约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正是在这种种条件约束下发挥出来的。

高等教育是一个投入稀缺性资源产出人力资本的价值形成过程。作为生产非物质产品的生产部门，投入资源是其前提条件，产出人力资本则是其终极目标。在资源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包括私人 and 政府公共投入高等教育的比例直接制约着高等教育的发展。由于资源稀缺是普遍和绝对的，任何使用稀缺性资源的生产活动都必须进行成本—收益核算，做到经济 and 合理，遵循价值规律。运用稀缺性资源的高等教育经营存在而且必须研究规模经济问题，这是高等教育投入产出过程中的客观要求。因为无论把投入要素作为因变量而产出作为自变量，或将投入作为自变量而产出作为因变量，整个高等教育投入产出会形成不同的规模和结果。当把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生产部门一同考虑进行资源分配时，宏观总体的部门均衡发展同样存在投入产出的规模经济问题。若是无限地扩大高等教育的资源投入比例，势必要限制其他部门的发展。而其他部门不发展，结果又会从总量和相对量及产出等方面限制高等教育的发展。如此一来，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必将陷入两难困境。因此，不顾宏观总体发展的高等教育发展未必合理。事实上，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与范围上是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鉴于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受

到一系列条件的严格约束，对此，我们需要有一种现实的、理性的态度，在高等教育发展问题上，既要看到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又要看到高等教育作用的发挥是有条件的，切勿陷入教育理想主义的泥淖。

无可否认，高等教育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然而，高等教育的发展又不可能偏离社会经济的宏观总体运行过程。因而，只有将高等教育纳入到宏观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才能有效地规范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正是从经济发展的视角去审视亚洲“四小龙”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可能要使一些命题和方法超出一般常识所能理解的限度，甚至有的观点会与原先某些公理化的结论相冲突。必须强调的是，只要我们抱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态度，不管怎样，我们的出发点无疑是通过全面而深入地研究亚洲“四小龙”发展高等教育的经验和教训，以为我所借鉴。

0·3 思路：从经济与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对应性的描述到相互关系的探讨

前面关于研究的逻辑起点和视角的阐述，已使本书的主题得到了概括说明。若再简而言之，那么主题可以归结为经济发展中的高等教育是怎样发展，以及发展的结果是什么的问题。由此推及，我们在借鉴亚洲“四小龙”高等教育发展经验时应该怎么样。围绕所提出的主题，为研究和操作的方便起见，本书的基本思路是先进行经济与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对应性的描述，然后渐进到对两者相互关系的探讨。整个研究将以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为历史背景而展开。

任何高等教育发展所涉及的主要内容都是宏观的高等教育层

次结构规模和微观方面的专业、学科设置问题。如果从动态角度来看,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方面的发展都可归纳为投入与产出的动态过程。具体而言,这个过程又可用成本—收益进行分析。

微观高等教育方面主要是指单个学校的规模经营问题,它是现代普遍存在的资源不足事实和教育各种功能目标的压力下,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直接制约着高等教育的质量。因为学校的运营总是要投入相应的资源要素,既然总体资源存在稀缺性,而资源本身又具有整体性和不可分性的特征,那么,学校的人力、物力、财力诸要素之间如何实现优化组合,在产出一定的情况下,遵循最小生产成本组合原则,或在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充分发挥要素的效率以获取最大的产出,这对于学校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和教育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高等教育微观方面经营规模不适度,教育资源利用率和教育质量便愈低。因此,高等院校必须趋于适度才能得到最佳效益。

宏观高等教育发展是指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等教育结构间的适度或协调问题。高等教育结构的合理性取决于对经济发展中的人力需求结构及技术结构的适应性。任何层类高等教育结构的设置若不从客观的技术和人力需求结构出发,结果必定造成人力与物质资源的双重浪费。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由此形成的技术与人力需求结构,既从投入方面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又从产出方面影响着高等教育的收益。高等教育结构的客观性特征同样要求它与经济结构之间必须均衡发展。

对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中的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首先要求对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两者的阶段对应性进行实证描述,并建立可供比较研究的相关计量模型。这是因为阶段对应性是进一步分析两者相互关系的前提。但这种实证描述并不等于简单地罗列和堆积历年来的统计资料,恰恰相反,通过两者对应阶段相关

指标的分析，为深入研究两者相互关系奠定了事实依据，同时也使本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范畴更加明确。

关于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对应阶段的划分，我们主要以总量和结构及政策的变动为依据。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大致在60年代开始起飞，经过若干阶段的发展，快速步入发达经济的行列。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里，各自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形成了由低级到高级的经济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它们在高等教育的发展方面也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政策，形成了与各自经济发展基本适应的高等教育结构规模。对其发展的阶段对应性分析，我们正是从这些方面着眼。试图通过实证性描述，提出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是如何相互影响，以及两者相关程度怎样的问题。

在界定了发展阶段对应性的基础上，我们通过一系列相关分析指标建立起计量模型，并对两者关系进行了总体定量分析。为了使初步的总体定量分析结论能得到事实支持，接着从微观和宏观方面对各自高等教育的具体运行问题中的相关因素进行研究，最后，在概括比较亚洲“四小龙”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同时归纳出其基本经验。全书可以说是围绕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相关程度这一主题而展开分析的。

本书的研究思路将在发展模式的比较及其启示中终结。虽然本书以历史分析为主，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解释现实，并规划未来。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本书副标题所限定的那样，这里所研究的主要是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中的高等教育问题。作为专题性研究，本书的内容不可能包罗万象。不言而喻，本书更多地是运用教育经济学理论去研究“四小龙”经济发展中的高等教育问题，它并不是高等教育问题的全部。就经济发展与高度教育的关系而言，我们基本上是在确立两者是否相关以及相关程度如何的命题基础上，沿着从投入到产出的动态思路，最后归纳

出各自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并看其对我们有何启示。当然，在论及专门的启示上本书着墨并不多，这是因为在分析过程本身中已包含了启示。

0·4 意义

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关系的重要性不仅来自经济与高等教育发展实践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教育经济理论发展的迫切需要。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是个陈论而时新的重要课题。早在五六十年代，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影响下，人们认同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途径，而人力资本的积累又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最高层次结构，更是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转换的决定因素。后来，许多国家（地区）在人力资本理论指导下所进行的教育投资虽然扩张了教育结构规模，但却并未带来预期的经济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结构的扩展，不仅未能显著地推进经济结构的变化，反而带来了严重的“文凭病”和人力与物力资源的双重浪费。于是，人们又开始怀疑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并从各个层面重新认识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如果将上述各阶段有关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观点归纳起来，不外有高等教育发展先行论和高等教育适度发展论两种主要派别。前者的理论基础是人力资本理论，其立论的出发点在于通过大规模发展高等教育，形成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用高级人力的数量超前发展弥补产业结构落后与物力资本不足的局面，从而达到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目的。后者的理论基础是部门结构均衡发展理论，其出发点是经济结构规模决定高等教育结构规模，高等教育供给应由高等教育有效需求来引导，只有在供给与需求

实现均衡的条件下的高等教育发展才能实现规模经济效益，高等教育无论从投入还是从产出方面都应与发展水平保持适度。

历史地看，韩国和台湾高等教育的发展都经历了规模扩张和适度发展两个阶段。相对韩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50年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超前性特征，当超前发展高等教育日益暴露出各种严重问题之后，韩国从60年代开始控制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台湾高等教育前期的发展与韩国有着相似的特征，尔后，台湾政府将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控制到以质量提高为主的适度水平上。香港和新加坡的高等教育则一直伴随经济发展而发展。

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的取得业已引起了对其原因的广泛探索。直到目前为止，对其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结构大都强调经济发展是高等教育超前发展的结果。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主要原因可能是指标的选取与参照系的差异所造成。实际上，亚洲“四小龙”的经验事实很难支持这种结论。有鉴于此，对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来自高等教育尚需进行实事求是地深入研究。因而，正确认识亚洲“四小龙”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仅对于教育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我们选择正确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尽管学术界对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教育等问题开展了广泛的研究，然而，从见诸报端的林林总总的文章来看，绝大多数都仅局限于某一方面的评述，对相互关联的诸因素有机结合进行分析的著作却鲜见，对教育更是多属经验现象的介绍，少有理论性的本质分析，尤其对教育—人力—经济发展锁链效应及其运行机制的深层规律未能揭示，以致只能从经验推断出并不完整的结论，并且，借鉴过程中可操作性的东西甚少。本书将从高度的理论视野，把高等教育纳入经济运行过程之中，运用被国际经济社

会广泛采用的投入产出分析技术及其他一些定量研究方法，从多维度、跨领域深入对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的关系进行宏观微观分析。

0.5 方法

科学研究需要方法与问题相适应。实际上，在前面阐述主题、思路和意义时已经蕴涵了关于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中的高等教育的研究方法的考虑。总的说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是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哲学基础和根本方法，本书的研究正是遵循理论创新必须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及由此体现的根本方法。

亚洲“四小龙”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一个历史阶段性很强的课题。在研究过程中，一方面要对时间跨度达 40 年之久的对应过程进行截面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勾画出相关变动的轨迹，寻求来自实践的经验结论；另一方面，还要在理论上建立相关分析的计量模型，并提出有关两者相关问题的一系列范畴，探讨经济发展中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及其运行机制。因而，历史方法与逻辑分析方法相统一就成为本书的基本研究方法。

根据这一基本研究方法的要求，对于历年来经济与高等教育的总量与结构及其效应，对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每次重要变动，对于所有这些含有时间因素的问题，需要按历史的逻辑顺序进行描述和分析。但是，仅限于罗列或堆积历年来的统计资料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实证分析，能够揭示出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诸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对于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相关的规律性作出符合逻辑演绎的科学解释。

当然，上述基本方法并不能包括本书深入研究所需要的更为具体的方法。由本书的主题所决定，除了以根本方法为指导外，

尚需以实证的、动态的、比较的方法去具体分析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的关系。

实证分析方法的选择取决于主题的具体特点。实证分析是在揭示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之间的阶段对应性，说明在不同阶段及条件下两者的关系和特点是什么。对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是由人力资本理论作出的。由于有关两者相关关系的实证分析中可以假定的因素较少，而且过多的假定会影响经验结论与客观实际相符的程度，因而，实证分析旨在对纷繁复杂的具体情况予以抽象，把一些在实际上看来难以界定其影响的因素，按研究的需要合理地选择。因为经济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较为具体，所以不可能用概念的演绎来反映其相关特点。本书先描述经济与高等教育的阶段对应性，后探讨两者的相关程度，在这种分析过程中逐步引进从投入到产出全过程的各种必要变量和因素，这样保证了经验结论的可靠性。

动态分析方法的选择则是因为亚洲“四小龙”经济与高等教育发展之间是一个变动的过程。不仅经济发展存在投入产出运动，在不同阶段也存在不同的变量，明显地含有时间性。而且，高等教育发展同样存在投入产出运动，在不同阶段也存在不同的变量。就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而言，依然存在阶段性特点，可以说，经济与高等教育的各变量都表现为时间的函数。所有用来衡量两者阶段对应性的指标实际上都是一些矢量，具有时间维度。由此可见，要有效地找寻出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之间的相关程度，就必须对从投入到产出的全过程进行动态分析。

比较研究方法也是本书主题所明确要求的。由于亚洲“四小龙”各自之间在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的水平、程度、制度框架，甚至文化传统等因素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确定对象之间共同性和差异性的比较方法就显得十分适合这一研究对象。在

本书的研究过程中，对经济与高等教育发展之间的相关分析有以下两种区分：一是国（地区）别模式中的相关变量分析，旨在探寻各自的模式特征；二是不同模式中的具体政策和措施的区分，旨在具体分析各自投入与产出的变化。在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时，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不仅要在表面上差异极大的事物之间找出它们本质上的共同点，而且在表面上极为相似的事物之间找出它们本质上的差异点，比较方法本身就包括求同比较和求异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对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之间相关的比较研究自始至终是在纳入比较一致的时间背景下进行的。

基于本书研究的重心，以及目前这方面研究所受的条件限制，本书的实证分析、动态分析和比较分析都是以定量描述为主的。

0·6 本书的逻辑框架

包括旨在提出问题、思路、意义和方法的“导论”在内，全书共由七大部分组成。

第1和第2部分是在确定亚洲“四小龙”经济与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划分依据的基础上，展开两者阶段对应性的定量描述及其相关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亚洲“四小龙”的高等教育并非如通常经验判断的那样是超前于（至少不完全超前于）经济发展。事实恰恰相反，亚洲“四小龙”的高等教育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同步于或稍滞后于其经济发展的。它们的相关程度也并不高。

第3部分是从投入方面实证考察“四小龙”的高等教育问题。本部分运用教育经济学的一系列指标体系，从历史的、动态的角度分析了亚洲“四小龙”高等教育投入的变动过程。研究发